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关于本电子书说明

本人由于一些便利条件，可以帮您提供各种中文电子书资料，且质量均为清晰的PDF图片格式，方便阅读和携带。文学、法律、计算机、人文、经济、医学、工业、学术等方面的图书，都可以帮您找提供电子版本，500万图书馆资源收藏供你选择。

我的QQ是859109769 佳佳e图书（提供完整版）

STRANGERS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陌生人

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美」张 鹏 著

袁长庚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超过两亿中国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寻求务工、经商的机遇。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再生产。本书所展示的是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以及跨区域联系网络的建立。通过展现一个典型的外地人口社区——北京丰台“浙江村”的发展、繁荣、拆除、重建，作者展现了后毛时代（post-Mao era）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本书挑战了“市场胜利、国家撤退”的简化论，强调要从更为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变迁当中去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214-1



9 787214 112569 >

定价：25.00 元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STRANGERS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陌生人

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美」张 鹏 著
袁长庚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美)张鹂著;袁长庚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1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Strangers in the city;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SBN 978-7-214-11256-9

I. ①城… II. ①张…②袁… III. ①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3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9942号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by Li Zhang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1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2-512

书 名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著 者 [美]张 鹂

译 者 袁长庚

责任编辑 王保顶

装帧设计 陈 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7 插页2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1256-9

定 价 25.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 编 刘 东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王保顶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

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中文版序

我感到十分荣幸我的第一本人类学专著的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其“海外中国研究系列”里出版并与中国读者见面。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于2001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当时所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是:第一,空间与权力的生产与在生产之间的复杂而密切关系如何在社会主义及后社会主义社会中呈现出来;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与互动上有何本质上的变化。我以北京城郊的浙江村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探讨这些问题,并希望能对流动人口这个群体做比较深入的认识,对改善政府的管理提供一些建议。我是一个人类学家,但我的视点绝不局限于田野调查,我力图在研究中把丰富的资料观察与具有深度的理论分析融为一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对我的思考分析影响很大的西方理论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v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及法国思想家福柯对权力、话语、知识的阐述。

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状况与政府的管理应对方式与我做田野调查时相比也有很大改变。但是我认为本书中探索的一些基本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同时本书也是对浙江村的发展与变迁的一个历史记录。

我的田野调查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完成,虽然到现在已有很多年没有机会回到浙江村了,但是我对当年做田野调查时热心帮助过我并接纳我的温州人,仍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我敬佩他们创业的勇气、甘于吃苦的精神和坚韧的生活力。另外我也要感谢支持我研究项目的几个基金组织: Fulbright-Hays 博士论文研究奖、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Wenner-Gren 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及我的母校康耐尔大学。本书的写作是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博士后期间完成的,那里浓厚多元的学术气氛对我的写作与思考影响深远。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译者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袁长庚对本书所做的精到的翻译,他的热情、勤奋与治学严谨都可以在他流畅的译文中体现出来。

张 鹂

于加利福尼亚东湾区

凤凰文库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 《走进马克思》 孙伯鍈 张一兵 主编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张一兵 著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 任平 著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 张一兵 著
《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 胡大平 著
《国外毛泽东学研究》 尚庆飞 著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段忠桥 著
《资本主义理解史》(6卷) 张一兵 主编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张亮 著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 谢永康 著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景源 主编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李景源 吴元梁 主编
《科学发展观:现代性与哲学视域》 姜建成 著
《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周穗明 王玫 等著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 张文喜 著
《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 孙伟平 著
《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阐释》 唐正东 著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哲学阐释》 欧阳英 著
《正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 王广 著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英]斯图亚特·西姆 著 吕增奎 陈红 译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 [英]保罗·鲍曼 著 黄晓武 译
《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 王浩斌 著

二、政治学前沿系列

-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 孔繁斌 著
《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 王海洲 著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 [英]斯蒂芬·卢克斯 著 彭斌 译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译
《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毛兴贵 等译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意]诺贝托·博比奥 著 陈高华 译
《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 [美]布鲁斯·阿克曼 等著 应奇 编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英]T. H. 马歇尔 等著 郭忠华 刘训练 编
《当代社会契约论》 [美]约翰·罗尔斯 等著 包利民 编
《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 [英]G. A. 柯亨 等著 吕增奎 编
《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 [英]欧若拉·奥尼尔 等著 徐向东 编
《宪政与民主》 [英]约瑟夫·拉兹 等著 佟德志 编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苏宝俊 译

《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 [美]赫尔曼·M. 施瓦茨 著 徐佳 译

《税收政治学:一种比较的视角》 [美]盖伊·彼得斯 著 郭为桂 黄宁莺 译

《控制国家:从古希腊至今的宪政史》 [美]斯科特·戈登 著 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 译

《社会正义原则》 [英]戴维·米勒 著 应奇 译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澳]安德鲁·文森特 著 袁久红 译

《新社会主义》 [加拿大]艾伦·伍德 著 尚庆飞 译

《政治的回归》 [英]尚塔尔·墨菲 著 王恒 臧佩洪 译

《自由多元主义》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庞金友 译

《政治哲学导论》 [英]亚当·斯威夫特 著 余江涛 译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王萍 傅广生 周春鹏 译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英]约翰·格雷 著 顾爱彬 李瑞华 译

《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 [英]乔治·克劳德 著 应奇 译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美]迈克尔·哈特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著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反对自由主义》 [美]约翰·凯克斯 著 应奇 译

《政治思想导读》 [英]彼得·斯特克 大卫·韦戈尔 著 舒小昀 李霞 赵勇 译

《现代欧洲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 [英]桑德拉·哈尔珀琳 著 唐皇凤 武小凯 译

《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约翰·西蒙斯 著 郭为桂 李艳丽 译

《政治经济学理论》 [美]詹姆斯·卡波拉索 戴维·莱文 著 刘骥 等译

《民主国家的自主性》 [英]埃里克·A. 诺德林格 著 孙荣飞 等译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英]乔·米格德尔 著 张长东 译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 [美]彼得·霍尔 著 刘骥 刘娟凤 叶静 译

《社会契约论》 [英]迈克尔·莱斯诺夫 著 刘训练 等译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 [澳]菲利普·佩蒂特 著 刘训练 译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冯克利 译

《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张国清 译

《社会正义论》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译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美]汉娜·阿伦特 著 孙传钊 译

《作为公道的正义》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允春喜 译

《古今自由主义》 [美]列奥·施特劳斯 著 马志娟 译

《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乔治·格劳斯科 著 毛贵兴 译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 [美]罗伯特·A. 达尔 著 范春辉 等译

《论伦理精神》 张康之 著

《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 [英]科斯塔斯·杜兹纳 著 辛亨复 译

《阐释和社会批判》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郭忠华 编

《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 应奇 主编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 [美]安娜·M. 史密斯 著 付琼 译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 编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英]迈克尔·肯尼 著 李永新 陈剑 译

《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 [美]珍妮弗·皮茨 著 金毅 许鸿艳 译

《论战争》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现代性的谱系》 张凤阳 著

三、纯粹哲学系列

- 《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叶秀山西方哲学论集(1998—2002)》 叶秀山 著
- 《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 黄裕生 著
- 《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 谢地坤 著
- 《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尚杰 著
- 《海德格尔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引论》 宋继杰 著
- 《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 赵广明 著
- 《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黄裕生 著
- 《理念与神: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及其神学意义》 赵广明 著
-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 王恒 著
- 《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 黄文前 著
- 《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 SEIN》 李文堂 著
- 《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 尚杰 著
- 《胡塞尔直观概念的起源:以意向性为线索的早期文本研究》 陈志远 著
-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 方向红 著
- 《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罗蒂哲学研究》 陈亚军 著
-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 刘永谋 著
- 《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 叶秀山 著
- 《学与思的轮回:叶秀山2003—2007年最新论文集》 叶秀山 著
- 《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 户晓辉 著
- 《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 倪梁康 著
- 《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 王齐 著
- 《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 黄裕生 著
- 《道路之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 张柯 著
- 《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 叶秀山 著
- 《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 张荣 著

四、宗教研究系列

-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研究》(上下卷) 杜继文 著
- 《中国佛教通史》(15卷) 赖永海 主编
- 《中国禅宗通史》 杜继文 魏道儒 著
- 《佛教史》 杜继文 主编
- 《道教史》 卿希泰 唐大潮 著
- 《基督教史》 王美秀 段琦 等著
- 《伊斯兰教史》 金宜久 主编
- 《中国律宗通史》 王建光 著
- 《中国唯识宗通史》 杨维中 著
- 《中国净土宗通史》 陈扬炯 著
- 《中国天台宗通史》 潘桂明 吴忠伟 著
- 《中国三论宗通史》 董群 著
- 《中国华严宗通史》 魏道儒 著
-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3卷) 潘桂明 著
- 《禅与老庄》 徐小跃 著

- 《中国佛性论》 赖永海 著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 著
《基督教思想史》 [美]胡斯都·L. 冈察雷斯 著 陈泽民 孙汉书 司徒桐 莫如喜 陆俊杰 译
《圣经历史哲学》(上下卷) 赵敦华 著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 著
《如来藏与中国佛教》 杨维中 著

五、人文与社会系列

-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美]威廉·贝纳特 彼得·科茨 著 包茂红 译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刘北成 刘小鸥 译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等译
《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 [美]A. 麦金太尔 著 宋继杰 译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美]R. M. 昂格尔 著 吴玉章 周汉华 译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英]约翰·凯里 著 吴庆宏 译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韩震 等译
《社会行动的结构》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 著 张明德 夏遇南 彭刚 译
《文化的解释》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1)》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霍伟岸 叶颖 译
《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陈周旺 译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 [美]理查德·塔克 著 罗炯 等译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 [英]基思·托马斯 著 宋丽丽 译
《男性气概》 [美]哈维·C. 曼斯菲尔德 著 刘玮 译
《黑格尔》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张国清 朱进东 译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美]罗伯特·K. 默顿 著 唐少杰 齐心 等译
《个体的社会》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翟三江 陆兴华 译
《象征交换与死亡》 [法]让·波德里亚 著 车槿山 译
《实践感》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蒋梓骅 译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 [美]利奥·施特劳斯 著 申彤 译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褚松燕 译
《传统的发明》 [英]E. 霍布斯鲍姆 T. 兰格 著 顾杭 庞冠群 译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美]海登·怀特 著 陈新 译
《卢梭问题》 [德]恩斯特·卡西勒 著 王春华 译
《自足语文学:为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辩护》 [挪威]赫尔曼·开普兰 [美]厄尼·利珀尔 著 周允程 译
《历史主义的兴起》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陆月宏 译
《权威的概念》 [法]亚历山大·科耶夫 著 姜志辉 译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英]王斯福 著 赵旭东 译
《王弼〈老子注〉研究》 [德]瓦格纳 著 杨立华 译
《章学诚思想与生平研究》 [美]倪德卫 著 杨立华 译
《中国与达尔文》 [美]詹姆斯·里夫 著 钟永强 译

-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美]韩书瑞 著 陈仲丹 译
- 《中华帝国后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黄卫总 著 张蕴爽 译
-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词中的园林与玩好》 [美]王晓山 著 文韬 译
- 《六朝精神史研究》 [日]吉川忠夫 著 王启发 译
- 《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 著 黄建华 黄迅余 译
-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彭慕兰 著 史建云 译
-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日]佐藤慎一 著 刘岳兵 译
-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美]王国斌 著 李伯重 连玲玲 译
-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日]岛田虔次 著 甘万萍 译
- 《为权力祈祷》 [加拿大]卜正民 著 张华 译
-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 译
- 《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斯·韦伯 著 洪天富 译
-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美]德里克 著 翁贺凯 译
- 《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D. 布朗 等著 朱勇 译
- 《文化、权力与国家》 [美]杜赞奇 著 王福明 译
-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 著 唐晓峰 译
-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美]史华兹 著 程钢 译 刘东 校
-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 [日]滨下武志 著 高淑娟 孙彬 译
- 《中国美学问题》 [美]苏源熙 著 卞东坡 译 张强强 朱霞欢 校
- 《翻译的传说:构建中国新女性形象》 胡纓 著 龙瑜成 彭珊珊 译
- 《〈诗经〉原意研究》 [日]家井真 著 陆越 译
-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美]高彦颐 著 苗延威 译
-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美]杜赞奇 著 王宪明 高继美 李海燕 李点 译
-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美]韩森 著 鲁西奇 译
- 《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 [荷]安国风 著 纪志刚 郑诚 郑方磊 译
- 《毁灭的种子:二战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 [美]易劳逸 著 王建朗 王贤知 贾维 译
-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美]李丹 著 张天虹 张胜波 译
- 《18世纪的中国社会》 [美]韩书瑞 罗有枝 著 陈仲丹 译
- 《开放的帝国:1600年的中国历史》 [美]韩森 著 梁侃 邹劲风 译
- 《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鲍吾刚 著 严蓓雯 韩雪临 伍德祖 译
-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日]中岛乐章 著 郭万平 高飞 译
- 《朱熹的思维世界》 [美]田浩 著
-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建构》 杨美慧 著 赵旭东 孙珉 译 张跃宏 校
-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 [美]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著 姜芹芹 译
- 《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 [日]松浦章 著 董科 译
- 《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 [日]顾琳 著 王玉茹 张玮 李进霞 译
- 《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 [日]松浦章 著 郑洁西 译
-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科大卫 著 卜永坚 译
- 《中国善书研究》 [日]酒井忠夫 著 刘岳兵 何莺莺 孙雪梅 译
-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 [日]城山智子 著 孟凡礼 尚国敏 译
-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 [美]马立博 著 王玉茹 译
-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 [美]卢苇菁 著 秦立彦 译

-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 [美]韩书瑞 著 刘平 唐雁超 译
- 《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 [美]易明 著 姜智芹 译
-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美]林郁沁 著 陈湘静 译
- 《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 [美]戴维·艾伦·佩兹 著 姜智芹 译
-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日]增田涉 著 周启乾 译
- 《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 [美]艾志端 著 曹曦 译
-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巴菲尔德 著 袁剑 译
- 《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 [德]狄德满 著 崔华杰 译
- 《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 [美]季家珍 著 杨可 译
- 《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 [美]艾米莉·洪尼格 著 韩慈 译
- 《银钱: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林满红 著 詹庆华 林满红 译
- 《寻求中国民主》 [澳]冯兆基 著 刘悦斌 徐碶 著

七、历史研究系列

- 《中国近代通史》(10卷) 张海鹏 主编
- 《极端的年代》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凡 等译
- 《漫长的20世纪》 [意]杰奥瓦尼·阿瑞基 著 姚乃强 译
-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钱乘旦 陈晓律 著
- 《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 钱乘旦 主编

八、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 《世纪末的维也纳》 [美]卡尔·休斯克 著 李锋 译
- 《莎士比亚的政治》 [美]阿兰·布鲁姆 哈瑞·雅法 著 潘望 译
- 《邪恶》 [英]玛丽·米奇利 著 陆月宏 译
-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 [英]弗兰克·富里迪 著 戴从容 译
-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美]丹尼尔·贝尔 著 严蓓雯 译
- 《流动的恐惧》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谷蕾 杨超 等译
- 《流动的生活》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徐朝友 译
- 《生活的艺术》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仇子明 等译
- 《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谷蕾 武媛媛 译
- 《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编 陈维振 陈明达 王峰 译 李平武 审校
-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英]丹尼斯·史密斯 著 萧韶 译
- 《萨义德》 [英]瓦莱丽·肯尼迪 著 李自修 译
-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 [美]理查德·沃林 著 吴勇立 张亮 译
- 《未来的形而上学》 [美]爱莲心 著 余日昌 译
- 《文化理论关键词》 [英]丹尼·卡瓦拉罗 著 张卫东 张生 赵顺宏 译
- 《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 [英]安德鲁·甘布尔 著 王晓冬 朱之江 译
- 《异端人物》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刘超 译
- 《当代文化理论》 [澳大利亚]安德鲁·米尔纳 著 刘超 译
- 《感受与形式》 [美]苏珊·朗格 著 高艳萍 译
- 《公共领域的伦理学》 [英]约瑟夫·拉兹 著 葛四友 译

九、教育理论研究系列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美]梅雷迪斯·D.高尔等 著 许庆豫等 译

《教育基础》 [美]阿伦·奥恩斯坦 著 杨树兵等 译

《教育伦理学》 [台]贾馥茗 著

《认知心理学》 [美]罗伯特·L.索尔索 著 何华等 译

《现代心理学史》 [美]杜安·P.舒尔茨 著 叶浩生等 译

《学校法学》 [美]米歇尔·W.拉莫特 著 许庆豫等 译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作为主体/对象的流动人口	24
第二章 商业文化、社会网络与迁移过程	51
第三章 空间的私有化	75
第四章 权力的私有化	97
第五章 性别、工作与家户(Household)的重构	123
第六章 犯罪与秩序	146
第七章 拆除浙江村	169
第八章 出走与回归	196
结论	213
附录:关于田野调查情况的说明	225
译后记	229
参考文献	232

引 论

1995年12月初,北京。天刚落雪,气温已降至零下十摄氏度。冬日严寒之中,居住在南郊的大约九万名来自乡村地区的外地人正经历着生命中一次剧烈动荡。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小企业主与商人。此时,在政府部门针对“流动人口”的专项治理行动的压力之下,他们被迫一夜间离弃城市中的家园。不到两星期后,他们其中的半数都已经被迁到北京最为偏远的地区,周边都是乡村。四十八个大规模居住区被拆毁,黄色的推土机所过之处,满布碎砖断瓦。一个曾经拥有繁荣的私有经济、生机勃勃的外地人社区一夜之间遍地狼藉。

此次旨在清理外地人居住区的运动,只是政府针对空间、权力和社会秩序所持续开展的激烈“战斗”的一部分。在后毛时代(post-Mao era)的中国,急速商业化和城市经济的勃兴,促使近一亿农民离开贫瘠的家乡,涌入中心城市去寻找就业或经商的机遇。^① 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被称为“流动人口”:中国经济改革及其与世界资本主义接轨的副产品(by-product)。

^① 这一数字只是根据官方和非官方的一些报告所得出的估计值。人们受到变动不居的市场需求的影响而不断迁移,因此大规模的精确调查数据非常难以获取。关于数据来源和中国乡村流动人口数据调查困难之类的详细讨论,可见苏黛瑞(Solinger 1999a)、马润潮和项飏(Ma and Xiang 1998)等人的讨论。

001 尽管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各自社会经济背景千差万别，但他们却拥有相同的目标：在城里赚钱致富。在这些来自乡村的过客中，有一部分人凭借少量的资本创立属于自己的小生意，开拓潜力无限的城市消费市场，不少人确实因此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但大多数涌入城市的外地人都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运气好的人可以在为大部分城里人所不屑一顾的行业里找一份临时工，例如建筑工地、饭馆、工厂、家政、环卫。不过也有很多人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只能绝望地从一地漂泊到另一地。他们不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并且往往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歧视，隔三岔五还会被驱逐。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大量来自乡村地区的人们每天涌入城市，梦想有朝一日发家致富。

尽管逐渐显现的市场力量，为农民突破户口制度的限制进入城市务工、经商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在人口流动、国家和城市之间仍旧存在着多重社会政治张力。虽然城市急需外地人提供的廉价劳动与服务，但对城市管理者和居民而言，流动人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他们眼中，外来人口将会消耗本就紧缺的各种资源，还会导致犯罪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上升。外地人从乡村来到城市，乡村政府鞭长莫及。他们无法被整合进入城市管理体系，因此往往被视为无序(out of place)和失控(out of control)。既有的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建立在相对稳定的人一地关系基础之上。对这一体系而言，如此数量庞大、难以管理的流动人口的存在无疑会带来诸多问题。此外，近期形成的一些流动人口聚居区令高层领导和城市官员更加不安，他们认为这些地方正在形成“政治真空”并将会成为滋生社会丑恶现象和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温床。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来管理流动人口，以应对其大规模迁移而形成的以社区为基础的(community-based)民间权力。

本书通过民族志研究，记录了在“晚期社会主义”(late-socialism)这一时代背景下，一个新兴的、非政府主导的流动人口社区发展，拆除并最终重建的全过程。在这里，“晚期社会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

刻,其间中国社会在多重社会经济力量的影响下经历影响深远的变迁。这些力量包括:市场化、私有化的推进;全球资本的涌入;以及此前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持续与演变。^①我关注的这个社区——“浙江村”——是北京最大的外来人口聚居区。^②在这个位于南郊的社区内,大多数居民是从“农民”转变而来的个体经营者,其家庭生意主要集中于服装加工和贸易。在一个市场化和人口空间流动不断增强的时期,通过观察这个社区在建立—拆除—重建过程中的政治博弈,我试图探究空间、权力和身份变迁怎样相互交织,重塑国家—社会关系。因此,本书可看作是一本关注晚期社会主义中国变化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民族志。

002

进一步说,本书将处理以下相互关联的问题:晚期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试图将农村流动人口转变为特殊的、新式的管控对象?在城市当中,农村流动人口怎样结成新的社会网络并塑造属于他们的社会空间和民间领导层?在流动人口内部,空间和权力的非正式(informal)私有化又带来哪些社会政治衍生品?在改革时期的中国,我们该怎样重新理解(reconceptualize)“国家”的概念,以便能够理解面对流动人口所带来的社会、空间的深刻变迁,不同的“国家的代理人”(state agencies)所做出的迥异的应对?

我将采取以下的方式来探究上述问题。首先,我将流动人口中业主义们的社会空间的生产置于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以此说明他们努力建构“第三类”国家—社会关系——一种外在于严格的城乡二元模型的国家—社会动态关系。我认为流动人口群体中出现一种新型的权力和领

① 尽管学者们已经习惯于用“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来描述改革年代的中国,但考虑到政治体制,我更喜欢用“晚期社会主义”来突出这一变迁时代的特点。这并不是说这种政治体制内部及其运作方式毫无重要变化,事实上,本书详细考察了许多此类变化。国家机器的扩张也还在继续。

②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书的田野调查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因此书中的一些提法在当下可能已经不甚准确,不过这并不影响全书的论述及作者的理论分析。——译者注

导权,而这主要通过外地人社区的空间、社会关系的建构(表现在私有住所和市场的建设)得以实现。抽象一点说,以现有权力关系为前提的社会空间建构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来源。尽管这种基于本地社区的新型权力无疑挑战了政府对生产、贸易和社区生活的垄断,但是,接下来几章中的材料说明,它仍旧通过非正式的庇护关系(patronage ties)与官方纠缠不清。

其次,本书从民族志研究的角度解释垂直分布的三个群体——地方官员、流动人口领导层(leadership)和普通流动人口家庭——何以结成庇护关系的联合(clientelist alliances)。在这种新兴的商业、政治庇护中,流动人口内部的民间领袖们扮演着“地方老板”或“政治掮客”(political broker)的角色,他们一方面规范市场秩序、社区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与政府协商争取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工作和做生意的权利。我坚持认为这种外来人口社区中所缔结的三角庇护联系不能被视为帮派之类的传统社会网络的复苏;反之,它高度商品化并使一种针对第三类管理对象——“流动人口”(严格意义上说,非城亦非乡)——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成为可能。在这里

003 “治理术”意为一套治理实践的策略或技艺。它力图通过多重社会领域,例如家庭、社区、话语(discourse)等等,来塑造、引导和影响人们的所思所为(见 Foucault 1991; Gordon 1991; 另可见 Ong 1999)。

第三,在分析社区内部持续的社会、空间关系重构及其与政府间关系的时候,我会将一种地方性的讨论置于首都北京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背景当中,而后者又由北京在全国范围内所处的独特的政治和象征地位所决定。政治领袖们的顾虑与下列诸多问题紧密相关:人们所居住的社区应当怎样组织,其依据是什么?在像北京这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私人资本、生产、贸易是被许可的?为了确保更大的政治稳定,政治控制 and 经济发展之间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平衡关系?政府日渐关注如何保持政治控制以及如何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新愿景。这种关切是上述种种疑问的根源,毕竟在眼下这个快速变迁的世界当中,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景黯淡。

政府对维持其管理新兴私有经济和非正规居住社区的能力怀有政治上的焦虑,而各地蓬勃发展的流动人口社区又使得这种焦虑被进一步恶化。这是因为,凭借亲属关系和同乡间的社会网络,许多外来人群将自身构建成为具有领导层和强烈区域认同的独立社区。而且,随着住房需求的提升以及资本的不断积累,一些规模较大也较为富有的群体已经建起临时的住宅和市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些城市当中部分地区的空间组织和权力动态。这种外来人口群体内部非正规的空间和权力私有化创造了地方性多重权力中心,与曾经处于垄断状态的国家权力形成竞争。

1990年代早期,因其距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仅有5000米,浙江村在政治上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此外,在城市官员看来,温州人经营的血汗工厂般的劳动密集型家庭作坊以及堡垒一般的住宅大院混乱不堪、缺乏秩序。因此,这一聚居区必然与后毛时代政权希望在首都所推动的那种依托高科技、大公司和国外资本的发展模式相矛盾。换言之,我认为有一种由政府推动的旨在吸引外资和国内旅游业的“晚期社会主义都市美学”(late-socialist urban aesthetics),而流动人口的家庭作坊恰与其背道而驰。

004

第四,本研究所关注的是流动人口中的企业主而非民工。前者可比作葛希芝(Gates 1996)所定义的“小资本家”(petty capitalists),因为他们都利用延伸的亲属网络和此前所积累的(preaccumulated)小额资本经营者家族生意。^①相反,民工一无所有,只能够出卖劳动力,并且其工作严重依赖城市劳务市场。作为有一定经济资本的制造商和经销商,与民工们相比,企业主可以建立以地缘为基础的聚居区、更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富有弹性的生意,因此显然更具优势。

以流动人口社区的建立为出发点,管中窥豹,本研究有两重更大的

^① 关于温州人来京之前如何筹措启动资金的更多地讨论见第二章,以及蔡欣怡(Tsai 1999)对中国农村企业家资金筹措策略以及建立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深入研究。

目的:其一是探索晚期社会主义中国权力、空间政治、动态变迁的国家—社会关系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再连接(rearticulation);再有就是说明这些变迁怎样深化我们对后社会主义变迁的理解。我对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空间生产和庇护关系网络(clientelist network)的建立的论述,挑战了西方话语中对后社会主义变迁的两种流行的假设:“国家的消退”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胜利”。^① 这些假设将后社会主义转变视为一种进步的、单线的运动,朝向一个已知的终点: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他们进一步假设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和其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开放会自动导向国家权力(经常被刻画为邪恶的、压制性的)的衰落,所以这样一种退却一定会导致平等的、民主的社会空间的形成。

近来对俄罗斯和东欧的研究质疑了上述关于后社会主义变迁的笼统论断,而尤其强调在这些快速变革的社会中经济和权力关系在文化上的重构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② 近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经验也清晰地表明,对在不同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一剂良药。有时市场甚至能够激化潜在的社会、经济、政治紧张关系。正如维德莉(Verdery 1996)所指出的那样:当“市场‘看不见的手’取代国家‘看得见的手’”,我们在很多地区所见证的是政治无政府状态、军事独裁、种族屠杀、黑帮势力抬头以及种种社会控制模式的出(重)现(另见Handelman 1993; Humphrey 1991; Ries 1998; Verdery 1991)。

对后毛时代的中国做出更为细致的观察就可以发现那些认为政府
005 衰落、市场胜利的假设充满经验上与分析上的双重问题。通过民族志研

① 例如,根据福山(Fukuyama 1989)“历史终结”的概念,社会主义终将消亡。作为最终的、普世的政治经济结构形式,所有人类社会都将迎来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尽管这一观点受到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批驳,但其仍旧对西方普遍流行的政治话语保持着影响力。

② 这方面的一些例证可参考维德莉(Verdery 1996),布里杰与派因(Bridger and Pine 1998),邦斯与卡萨纳蒂(Bunce and Csanadi 1993),华如碧(Watson R. 1994),韦艾德(Winckler 1999),斯塔克与布鲁茨(Stark and Bruszt 1998)等学者的研究。另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鉴于在不同国家当中,社会主义存在的形式各异,因此对社会主义能否做出一般性的概括都是个疑问(见 Sampson 1991; Hann 1994)。

究,我认为中国的党—政府(*party-state*)应被理解为是内部分离的管理体制,既推动市场力量的发展,同时仍旧在塑造人们日常生活、社会空间和认同方面扮演突出角色。但与此同时,政府权力运作的方式确实已发生改变。在这一背景下,非正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并非存在于政府权力缺席的真空之中;相反,它们成为争夺对空间、身份、私有经济以及另一类城市生活模式的控制权的新场所。

因此,与其追问日常生活中涉及多少政府权力,我更打算去审视中国社会主义治理术(*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的模式及其焦点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我强调对于流动人口管理的两点显著变化:一是逐步转向解除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但加强对其在落脚城市当中的管理;第二是逐步利用流动人口当中的民间领导层来作为其自我管理的社会力量。

本书中所揭示的政府所持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曾为其他中国研究学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考察(见 Perry 1994; Walder 1986; Oi 1989; Solinger 1999a)。例如,在她关于中国政府过程(*Chinese state processes*)的研究中,许慧文(Vivienne Shue 1988)对那种认为在改革年代社会主义政府日渐萎缩的观点表示深刻怀疑。她近来在华北某小城中的研究显示,侵入式、压制性、限定性的政府权力模式的“稀薄”(thinning)往往伴随着由地方官僚机器扩张所支撑的管理性、促进式权力的“稠化”(thickening)(Shue 1995)。安德训(Anagnost 1997)提醒我们:中国的党和政府在重构所谓“文明公民”(civilized citizens)这一后革命时代主体的过程中仍旧保持支配性角色。同时,罗丽莎(Rofel 1999)认为政府运作并不必然反对市场力量,而是利用后者来建设很多中国人所渴望拥抱的后社会主义现代性。

在中国的改革年代,政府与其适应新形势的能力的持续的关联使那种认为后社会主义世界里政府力量将会撤退的观点成为疑问。因此,在另一层面,本书尝试展示中国流动人口的的经验何以证明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权力和空间的复杂重构。它反对将社会主义的转型看作是划时代更

006 迭、正义战胜邪恶、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或民主压倒集权之类含有进步论调的线性元叙事(metanarrative)。中国流动人口起伏挣扎的故事说明,尽管其所创造的社会空间可以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政府支配,但他们还远未形成可以孕育民主政治的公民土壤。我所了解的流动人口是建立在无所不在的、等级分明的庇护网络(patron-client network)之上,而这一网络又使得新的社会控制和剥削成为可能。

接下来,我将本书的若干主题概要式地置于人类学、社会学更为广阔的视野中。除了简要论述我对这些议题的思考怎样受到相关理论发展的影响,我还将说明本研究对更为动态和全面地理解空间—权力和国家—社会关系所能做出的进一步贡献。

空间与权力

空间经常被看作是外部的(external),因此在关于地方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人类学分析当中,它往往被忽视。相反,在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解释中时间和时间性(temporality)却被置于优先地位。但是,正如文化地理学者们所证明的那样,社会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场所或“容器”;反之,它与所有的社会进程都有深入联系(见 Harvey 1989a; 1989b; Soja 1989; Massey 1994; Watts 1992)。一方面,空间通过实践和权力关系得以建立;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和政治支配也在空间中形成、转化。用福柯的话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和权力的任何操演当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Foucault 1984: 252)。通过将空间形构和权力技术(techniques of power)的紧密关系理论化,福柯清晰地论述了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怎样被创造和规训(Foucault 1972)。

我将中国空间生产与流动人口的影响力连接起来的尝试,尤其受到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vebvre)的影响。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列斐伏尔考察了真实

的、有生命的(lived)社会空间(与空洞的“物理空间”和抽象的“精神空间”相对)怎样为人们具体的实践所生产,又如何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形塑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处于社会、政治斗争中的中心:

对以目的为导向的行动与斗争而言,空间正在成为原则性的利害关系。当然,它是资源的聚集也是种种策略所得以实施的中介, 007
但是现在它正在变成某种东西,不只是行动的剧场、环境或毫无利害关系的舞台。空间并未将那些在社会—政治竞技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的其他物质和资源清除。……更为确切地说,它将这一切集中在一起,进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将每一个因素包裹起来而分别取而代之。(Levebvre 1991:410-411)

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了流动人口社区制造(community-making)的政治学(politics),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列斐伏尔的两点洞见密切相关。首先,列斐伏尔将空间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控制的核心要素。他写道:“除了充当一种生产工具资料,它(空间)也是控制手段,因而是支配性的、具有权力的。”(Levebvre 1991:26)考虑到社会空间为家庭的再生产、劳动力的生产以及阶级关系的维持提供必要的场所,因此它可被视作一种基本的生产工具。要理解为什么对城市空间的占用构成中国流动人口在社会、经济方面奋斗的基本内容,将社会空间看作是生产的支撑这一点极为重要。

其次,列斐伏尔认为如果我们认可空间是社会性的建构,那么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空间的生产而非观察空间中的事物,而这处理的恰恰是空间的历史与时间性(temporality)。因此,关注空间过程(spatial process)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拒绝时间观念的对社会空间的研究。本书关于浙江村的研究,将时间、空间整合进同一分析框架,并且不将社区的空间组织视为地方政治的静态集合。相反,我坚信恰恰是通过关于空间的

历时性的争论,外来人口同政府的协商才能与地方性的权力动态(local power dynamics)连接起来。因此,我的民族志研究聚焦于外来人口聚居地被创造和再创造(making and remaking)这一持续过程。

008 尽管许多人类学家曾经探讨过资本主义语境下空间和权力间相互建构的关系(见 Harvey 1989b; Gupta and Ferguson 1997),但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中,这一问题所受到的关注仍显欠缺。我希望本书的研究能为当下展开的相关理论探讨加入一些来自晚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的民族志洞见。如果如列斐伏尔所说,社会主义倾向于创造更大的生产中心和更强的政治权力中心,那么通过建立地方性的生产、贸易和权力中心,当下中国流动人口群体中展开的非正式的空间和权力私有化则代表着对上述倾向的回应。

在早期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的生产性角色及其在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与权力的固有联系很少得到关注。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以城镇为中心的地方和区域等级系统所做出的经典的结构性分析(Skinner 1964 - 65, 1977a)。尽管施坚雅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独特的空间模式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分析,有助于推动人类学中国研究超越村庄视野,但我们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争取社会权力时对物理空间的利用依然知之甚少。近年来,人类学家对城市和跨地区环境下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国家权力、性别关系和文化政治学的兴趣有所提升(见 Anagnost 1997; Brownell 1995; Yang 1994)。尽管这些研究为理解迅速变化的中国城市社会提供了极为必要的人类学见解,但对空间在塑造这些社会、政治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注和理论化的程度仍旧不足。^① 在本书中,通过关注空间、权

^① 近来对后毛时代城市空间的研究包括罗丽莎(Rofel 1999),戴慧斯(Davis et al.),何琳达(HersHKovitz 1993)。同时一些历史学家对探讨城市空间在塑造中国20世纪早期的日常生活、城市政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了很多精彩研究,包括董玥(Dong 1996),周锡瑞(Esherrick 2000),卢汉超(1999)等。

力和流动人口,我意在填补这一经验材料和概念上的空白,并由此推动多面向的城市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发展。

我通过三个方向来研究流动人口内部权力生产和空间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我将展示空间流动的增长如何使中国数百万此前被捆绑在乡土之上的农民得以进入城市获得工作和经商的机会。对这些贫困的农民而言,作为一种空间实践,迁移成为他们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第二,我将分析流动人口家庭空间重组的特定形式,家庭生意对女性工作的价值的提升,以及由此对性别、家庭关系的重塑(见第五章)。第三我将具体呈现中国的流动人口如何通过将部分城市空间据为己用,由此开始掌控其自身的经济和公共生活。没有自己的物理空间,外来的业主们不能在城市当中建立自己的社区并取得生意上的成功。尽管流动人口事实上并不享有城市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通过与地方官员们建立庇护关系(clientelist),便能够挑战或利用土地使用条例。^① 流动人口社区当中非正式的空间私有化增强了一种民间领导层(popular leadership)的权力。总之,通过关注“在既有生产方式当中,作为知识和行动的(能动的、操作性的、工具性的)空间的角色”(Levebvre 1991:ii),我们可以更009
好地理解空间移动和地点制造(place-making)是构成城市中流动人口争取权力、控制力和居住权的一个重要部分。

最后,在本研究中我将权力概念化为一种关联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而非仅仅由统治阶级所把持的事物。我研究权力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展开运作,其中介可能是的话语和非话语(discursive and nondiscursive)实践,正规的、可见的国家机器、社会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松散的社会网络。汉语当中没有英文“power”的一般用法,我的受访人们经常以“权力”和“势力”这两个词来指代其斗争和社会控制力。“权力”指的是行政力量,这取

① 在社会主义中国,土地或为国家所有,或为集体所有。在城市中,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分配给集体或国有单位。但是在改革时期,土地和空间商品化程度都有提升。

决于政府给某人所委任的职位；“势力”则委婉地形容一种立足于当地的社会、政治影响力，这是某人的财富、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人特质所决定的。即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够同时获取以上两种力量，但因其具有不同种类的社会、政治基础，所以不能叠放在一起加以分析。^①

晚期社会主义(Late-Socialism)条件下国家—社会的重新连接

在大多关于后冷战时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政治学家认为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单一的、威权的、集权统治。^② 在这一图景之中，国家统治似乎是稳定的铁板一块，丝毫没有空间去考虑人们能否发挥能动性来影响政策轨迹。稍后，随着对“文革”期间政治领袖之间激烈权力斗争的了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集权主义的解释模式，转而倾向于用一种多元的途径(或方法)去强调高层领袖之间的内部分化和矛盾(例如 Nathan 1973)。但是，由于主要着眼于高层政治，所以这一途径对于理解非精英层次的中国政治启发甚少。

后毛时代的研究对僵化的二元思维将国家—社会定义为互相对立、分离的主体感到越发不满。^③ 学者们运用其在不同背景下的研究来强调地方政府机关与多种社会要素之间深层纠葛。例如，在对改革期间政—商关系重构的分析中，裴松梅(Pearson 1997)和王达伟(Wank 1999)认为有两种重要性持续上升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即“法团主义”(corporatism)和

① 在其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当中，罗德明(Dittmer 1978)指出在高层官僚当中“权力”和“势力”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他认为“权力”是基于在党和国家的等级当中所处级别、职位而获得的正规的权力，而“势力”则是声望、资历所形成的非正式的力量。虽然他经常将“势力”译为影响力，但我认为这种区分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将“势力”视作一种特定形态的、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形式，能够强调非正式关系网络和文化资本在政治空间内部的核心地位。我的观点并不是将“势力”等同于权力，毋宁说是强调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当中西方的 power 的概念需要被分析和进一步细化。

② 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变迁这一复杂领域给予我诸多启示的一些学者有裴宜理(Perry 1989, 1994)和许慧文(Shue 1988)。

③ 许多出色的学者都持这一态度，例如许慧文(Shue 1988)，魏昂德(Walder 1986)，戴慕珍(Oi 1989)，苏黛瑞(Solinger 1992)，怀特(White 1993)，王达伟(Wank 1999)，陈佩华，赵文词和安戈(A. Chen, Madsen, and Unger 1984)。

“庇护主义”(clientelism)。与过去相比,在这两种模式中,政府部门与私有企业之间存在更为深入的相互纠缠。

从1980年代末开始,专注于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者越发关注政府权力这一问题,并将其置于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他们不再分析划时代的政治事件、官僚机构的结构或是国家政策制定,而是聚焦于政府权力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当中运作的日常实践和象征过程。^①在考察日常生活中政府主导权的同时,他们还关注这种主导权是怎样不断引发争议甚至有时被次级群体所颠覆。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民族志的路径来深化这种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我认为将民族志研究与其它路径区别开来的不是其分析的规模,而是“国家”这一概念本身。民族志不把国家看作是既定的政治实体,而是从它是怎样通过日常实践而被想象、遭遇、挑战、重组这一点出发(Gupta 1995)。换言之,我们对国家的分析,需要从一种基于制度(institution-based)的分析转向“实践导向”(practice-oriented)的分析。要从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中超脱出来,福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这一概念尤为有用。治理术,或曰治理行动的艺术,同时通过政府内部和外部的进程表现出来。各种社会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都可以起到权力统治的作用,以形塑人们对自我和行为举止的观念。考察不同社会领域中种种治理策略的模式对我的研究计划至关重要。因为,就像我将要展现的那样,无论是将流动人口转化成为新的管理对象还是发起清理整顿流动人口社区的行动,都是通过政府机关和其他社会因素同时作用才能得以实现。

我在本书中通过三个方面的工作来深化对晚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动态关系的理解。第一,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

^① 关于中国后毛时代政府权力的日常和象征形式,可见安德训(Anagnost 1997),包苏珊(Brownell 1995),罗丽莎(Rofel 1999),萧凤霞(Siu 1989),和杨美惠(Mayfair Yang 1994)等学者的研究。这些研究深受人类学研究当中那种试图将“国家”带回文化和社会分析当中的理论取向的影响,并为这一不断发展的领域做出各自贡献(例如 Borneman 1992; Gupta 1995; Herzfeld 1992; Mitchell 1991; Taussig 1992; Verdery 1996)。

相对稳定和完善的乡村或城市社区,与此不同的是,我这本民族志主要关注新兴的流动人口怎样在日常生活中重新与国家产生联系。几乎没有成型的权力结构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可被视为一个独特场景,从中可以观察非正式的权力与权威得以形成并挑战政府支配地位的过程。苏黛瑞(Solinger 1999a)在她《论城市中国的公民身份》(*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一书中探究了政府、市场和进城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她的分析着眼于宏观的结构性层面,但本书旨在深入观察一个流动人口社区建设与破坏的微观过程,试图展现其中所体现的空间、权力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二,我对浙江村的记述,尤其重视不同行政级别官员和不同地区政府(例如北京和温州)对经济发展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关系看法如何不同。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因地域、环境、时间的不同而发生极大的变化,但这种时空上的多样性却还未得到充分的注意(Perry 1994)。我相信揭示各政府部门之间不同的态度和行动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流动人口空间政治学的理解。

第三,我对流动人口社区内部的庇护关系网络有详细的记录,同时我会分析那些扮演“政治中间人”(political broker)角色的社区老板们的重要性,当政府部门与流动人口之间发生问题时他们居中协调。^① 尽管在中国政治史当中,国家与社会的纠缠关系古已有之(见 Perry 1994),但我认为在市场化 and 商品化的时代,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所缔结的非正式联合在程度上更深,形式上更为多样。^② 学者们已经阐明:当资源和机遇的分配不平衡时,就易于出现庇护关系(见 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Flap

① 我所借用的政治中间人(political brokerage)这一概念曾为许多讨论地方政治领导权问题的学者所论证过,例如巴斯(Barth 1959),文森特(Vincent 1971),施内德夫妇(Schneider and Schneider 1976),斯沃茨(Swartz 1969)等。在其关于中国农民革命的研究中,萧凤霞(Siu 1989)使用这个概念描述那些协调国家和民众之间关系的党政干部。

② 我将商品化定义为产品、土地、空间、时间、劳动、社会关系和权力成为商品,其使用价值包含于交换价值之中的过程(见 Marx 1977)。

1990; Foster 1963; Schmidt et al. 1977)。建立在个人忠诚、义务以及隐蔽的压制、剥削关系之上的庇护网络,对那些在中国城市社会中没有正式身份因而无法从合法渠道获得资源和商机的流动人口业主而言尤为重要。因而,他们所建立的这套非正式网络动摇了政府控制的垄断,造成了官僚系统内部的竞争并且帮助外地人在城市中获得保护和资源。但是,这种网络也会被官员所利用,以延伸他们对于流动人口社区的间接控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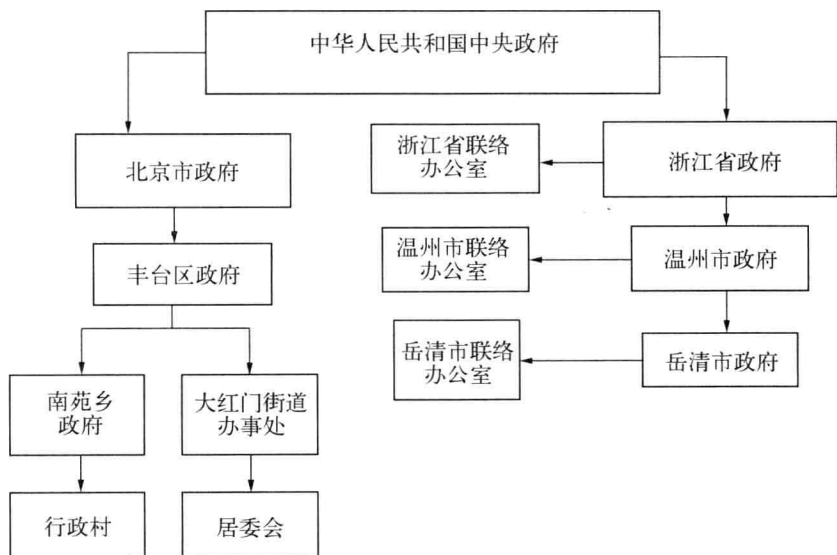


图1 政府部门级别示意

既然我在本书中会经常提及那些与温州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很多政府部门,且对这些部门的行政等级、分管职能和所辖地域做出区分很有必要,所以我在此以图示方式加以说明(见图1)。每一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都大致相同,在这里不再一一列出。与流动人口生活关联

^① 温州人和官员们建立商业联合关系的能力与其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密不可分,作为私营业主,他们在后毛时代经济序列中获益最多。对政府和私营企业家关系变化的论述可见王达伟(Wank 1999),扬(Young 1995),苏黛瑞(Solinger 1984),高棣民(Gold 1989, 1990),布鲁恩(Bruun 1993),裴松梅(Pearson 1997)以及葛希芝(Gates 1996)等学者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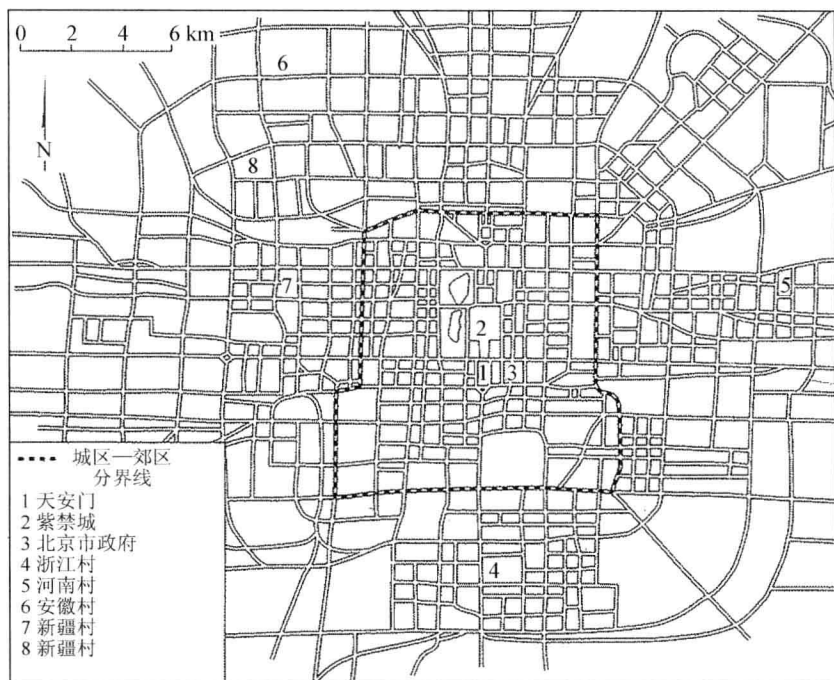
- 012 最为密切的四个部门是工商、税务、公安和城市规划。贯穿本书,我以“上级政府”(upper-level government)来指代中央和省市政府;“基层政府”(lower-level government)来指代区、街道和乡镇政府。

发现浙江村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为1994年夏天、1995年6月至1996年9月,前后共计16个月,地点包括北京和温州两地。此外,我还在1998年1月、1999年7月进行了两次追踪研究以跟进目标社区近来的一些发展。北京是中国人口城乡流动的主要流入地之一,截至1994年,北京市(包括郊区)除1200万常住人口之外,还吸纳总共329万暂住人口(Beijing Municipal Planning Committee Research Team 1995)。但西方学界关注中国国内人口流动的学者却对这座城市关注甚少。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地缘政治当中位置独特,而这也对那里人口流动的意义和结果有所影响。由于上述原因,我决定对北京人口流动的政治学(politics of migration)展开研究。

- 013 1994年夏天,我第一次从一些北京市民那里了解到所谓“流动人口”并不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一直“流动”。实际上,当时有许多相对稳定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在城郊一带蓬勃发展。城里人将这些在空间和社会意义上都界限分明的聚居区称之为“村”,其依据是各个社区当中居民的原籍省份。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强烈吸引着我,因为在我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从未有类似的状况发生。我决定找几个此类社区看一看。但是尽管大多数北京人都知道这些“城中村”的存在,却没几个人能说出其确切地址。经过两个星期的多方打听,我得以确认其中四个最为著名的社区:浙江村、安徽村、湖南村、新疆村,他们分别由来自相应省份的人们所建立(见地图1)。^①与

^① 朝阳区河南村、海淀区安徽村的居民主要从事废品回收、蔬菜零售和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维修工作。新疆村有两处不同地点(西城区甘家口和海淀区魏公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族人那里开办了许多饭馆(对这些社区更为详尽的描述见 Ma and Xiang 1998)。



地图 1 北京市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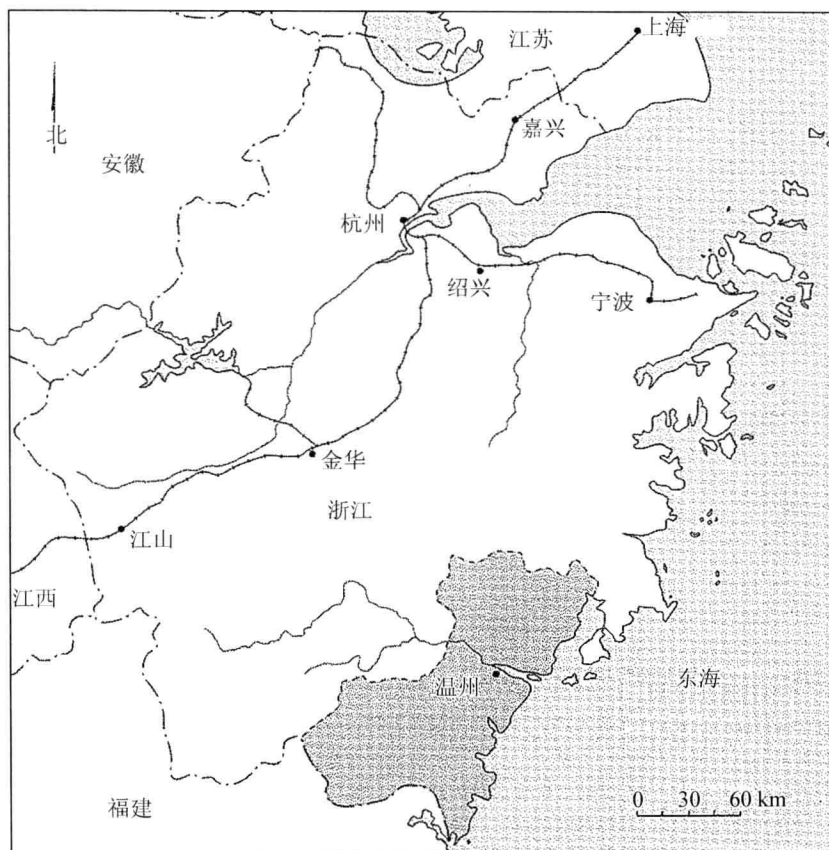
大多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棚户区不同,中国城市当中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其居民并不单是外地人。这些所谓的“村”里往往同时居住着有固定身份的郊区居民以及从本地人那里租赁房屋的外来人口。

浙江村是这其中规模最大也最为完善的一个社区。^① 1995年,这里居住的外来人口总数接近十万,其中多数来自浙江省(中国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温州市(曾经是一个行政专区,现在已经正式成为地级市,见地图 2)。更具体地说,这里的温州人主要来自岳清和永嘉两地——这是隶属于温州市行政区划内的两个面积较大的农业区(见地图 3)。^② 尽管 1990 年

^① 我使用现在时来描述这里的情况,是因为尽管经历了政府的拆除行动,但重建之后的浙江村在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都保持了与往日相同的状态。(这一注解主要是针对英文当中时态问题,中文读者当不会有类似的困惑——译者注)

^② 温州是一个地级市,所辖区域广阔。岳清是县级市,由许多乡村和一片乡镇规模的市区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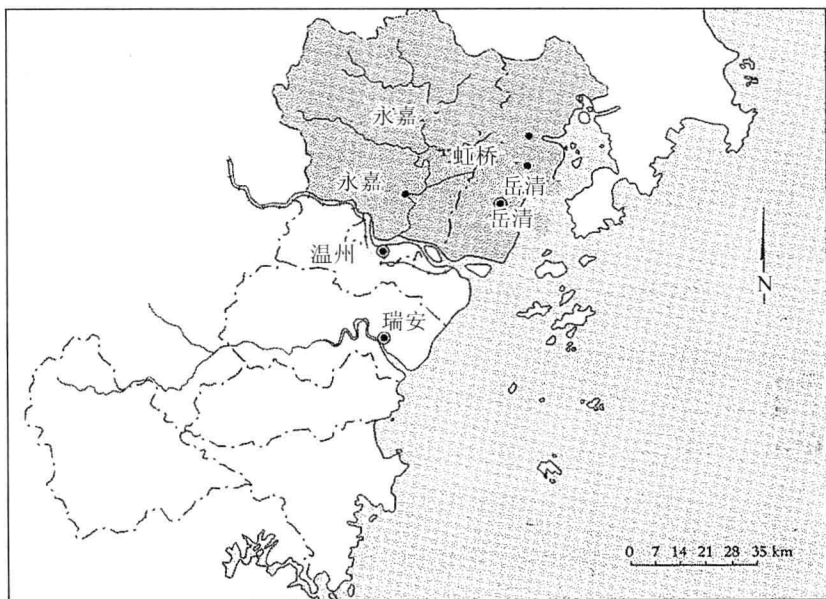
代早期岳清就被重新确立为县级市,但和永嘉一样,其境内仍旧主要是乡村地区。在北京的温州人大多是从从事制衣业的个体小业主和商人。



地图 2 浙江省地图

015 由于浙江村已经被严重污名化(stigmatized)并曾数度遭遇市政府的“清理”,因此那里的温州人对试图在社区中展开研究的“外人”(通常可由其口音来加以识别)保持高度警惕。一个研究者若无与当地温州人家庭的关系,便可能被视作是政府派来收集信息的“探子”或是可能写出一些令人反感的、妖魔化温州人的报道的记者。鉴于这种情况,一位本身就是温州人且在浙江村进行过长期田野调查的朋友将我介绍给当地人。

在我田野调查的第一个月当中,他多次陪伴我进入社区,并介绍我认识当地一些重要的老板及普通家庭。通过他与当地人的友好关系以及居中协调,我得以从一个陌生人转变为温州人的朋友。一旦几个家庭将我接纳为常客,我向其他家庭拓展个人联系就变得相对容易。当他们其中一些人从闲谈当中得知我母亲出生并成长于浙江省省会杭州时,便乐于将我认做“半个老乡”。因此,同乡认同(native-place identity,其所依据的地理界限是弹性的)是与温州业主们建立密切关系的一个有力的方式。



地图 3 温州市地图

我总共采访了来自 70 户家庭当中的 110 人,并与社会经济背景各不相同的许多外地人展开过不计其数的非正式交谈。这其中大多数访谈都是在受访人的住处,或是他们工作的商店、摊位进行的。两类地点成为我的主要研究场所。其一是温州人从事服装批发零售的市场。因为多数居住在大院当中的外地人都从事服装生产,因此在市场上我可以

有机会与专门从事贸易的外地人交谈。同时,在市场上我还可以以匿名的大学学生或顾客的身份来与摊主进行互动。

017 我的另一个主要研究场所是外地人居住的“大院”,在我刚开始田野调查时,近半数的外地人居住在此。这些大院是与受访人建立长期亲密关系的理想场所,因为与居住在当地农民家中的外地人相比,这里的人们更为开放也更易于接触。居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家庭往往彼此熟识且平日里交往频繁,因此我很快就和共享同一物理空间的各家各户熟悉起来。

但是正当我开始享受大院所提供的开放与便捷时,政府发起了清理浙江村的行动。我的受访人当中近半数住处被拆除并且被迫离开北京,以致田野调查进行到一半我便失去了与他们的联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震惊,花费几天时间琢磨如何才能与四散各方的人们重新取得联系并曾一度怀疑这无法实现。虽然担心自己的研究无法完成,但同时我也牵挂那些已经成为亲密朋友的那些外地家庭的命运。在报上登出清理浙江村行动“取得胜利”的简报之后,许多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来询问我下一步的打算,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调查地。事实上,这个社区并没有永远消失,数月之后,它甚至有所扩张。但大多数北京人认为这里不会长久,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一天,当我焦躁不安地翻检调查笔记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我可以通过拨打移动电话来与温州业主们重新建立联系。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他们大多备有传呼机或大哥大,许多人曾给我留下过号码。我一跃而起,冲向电话。一天下来,我找到至少 15 个家庭,其中一些仍旧隐匿于市郊,而其他则已经搬出北京。

这期间我还去了一趟温州岳清,恰逢农历新年,我和两个流动人口家庭共同度过了半个月。我的目的是理解来自温州的流动人口与他们的家乡之间保持着何种社会经济联系。这种切换以及我田野调查地点的那些不稳定形势决定了我对那种习以为常的“社区”观念产生疑问。

在这里,流动人口社区并非一个自然的、确定的、长久的地点,而是不断通过空间和时间维度的政治经济斗争被制造和再造(见 Malkki 1995)。

接下来,我将转而介绍浙江村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这个社区没有固定的地理边界,而是分布于南城丰台区的几个大的街道当中。关于浙江村的起止边界,人们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那是一片由先前就存在但现在集中居住着温州人的大约 25 个村庄所构成的区域。另一些人认为只要有温州人的地方都属于浙江村,包括北到三环路、南至南苑、西起马家堡、东达小红门的一大片区域。另有一些人告诉我说浙江村泛指这城市里任何有浙江人居住的社区,而并不特指某地。边界的不确定说明浙江村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群体,可以将既有的许多社区转化为其领地并显示其存在。 018

这个聚居区是动态和开放的。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廉价服装制贩中心,也成为北京市发展壮大中的“第二经济”(secondary economy)^①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商业活动,已拓展至超越北京一地的其他城市和省区,甚至远及境外,到达俄罗斯和欧洲部分地区。因此,这地方决不像官方所描绘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小独立王国”。

第三,与大多数城市居民和官员们所认定的状况相反,这一社区的社会构成多元而非铁板一块。在这片广阔区域内,若干社会群体共同居住在一起,包括温州人(5.6 万人)、本地北京居民(1.4 万人)以及其他来自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四川等省的流动人口(4 万人)。大多数非温州籍的外地人都是雇佣劳动力,他们给温州籍雇主们打工,例如服装缝纫、零售和保安员(见 Ma and Xiang 1998)。由于温州人占总人口中的大多数,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比本地人和其他外地人在经济上更有实力。

① 这一术语最早被经济学家用来形容冷战时期东方集团(Eastern Bloc)的经济变迁(见 Grossman 1977)。后来中国学者借用它来形容“正规的、中央计划经济之外的所有经济行为,包括私人建筑业、制造业、商业、运输、手工业、修理、服务及其他利用非上班时间、以获取私人收入为目的的兼职工作”(Nee and Young 1990: 3)。

最后,温州外来人口社区的命名值得更为细致的考察。“浙江村”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 1980 年代末,随之而来的是北京人在温州人聚居区和城市其余部分之间所做出的社会区分(见 Xiang 1996; Wang 1995)。这一名字的第一部分“浙江”,是这些外地人故乡省份的名称(而非地区的名称“温州”),第二部分“村”则含有诸多社会意义。“村”在这一语境中不仅标示出这一群体出于农村,同时也指示出这一社区在社会意义上的孤立与空间上的局限性(boundedness)。城市当中的“村”意味着某种与都市既有秩序无法协调且格格不入的异常事物。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城市人对外来人口居住区的负面想象。简言之,“浙江村”实质上是城市人强加于温州人的一种带有误导性和疏离感(alienating)的名称。正如一个人这样解释道:“它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地方肮脏、狭隘、粗野甚至对北京社会抱有敌意”,因此,大多数温州人不喜欢这个标签。

本书结构

通过这本民族志,我希望在对于温州流动人口的记叙当中整合时间与空间。因此,章节的编排体现了社会的、空间的发展在时间上的前进,而非仅仅走马观花地呈现社区状况。本书章节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但每一章都有其主题关注并提出一组特定的问题。

中国政府试图将来自农村的外地人转化为一种新的对象,其途径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分类(流动人口)并在日常实践中采取种种策略对其进行监督和规训。第一章是对这一问题的较为宏观的分析。在这一对象制造(subject-making)的双向过程中,或者用王爱华(Ong 1996)的话说“自我制造与被制造”(being-made and self-making),我将展现来自乡村的外地人如何通过创造超越单一、固定地理区位的社会生活模式、多重焦点(multifocal)的社区生活来颠覆并改变(revalorize)“流动”这一分类的含义及附着其上的负面形象。

从第二章开始,我将进入对北京浙江村形成过程中空间、权力和政府的具体论述。我将追溯历史上独特的商业文化和小资本主义经济(petty capitalist economy)如何滋养了当下温州流动人口的经济与空间实践。接下来我将记录他们流动的过程,并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依据家庭和籍贯所形成的社会网络。空间 and 权力的非正式私有化(informal privatization)是两个并行的过程,这是三、四两章考察的对象。我在第三章中记录了温州人如何从本地农村获得土地建筑大规模居住区,并分析这种新的空间形态的社会和政治含义。第四章论述了外来人口中正在成型的民间领导层的社会和空间基础,以及他们在维持本地秩序中所扮演的协调角色。温州人家庭和生产的空间重构与不断变化的性别、家庭关系之间的互动是第五章所探究的问题。第六章关注的是流动人口社区内部的犯罪问题。对违法犯罪、秩序混乱的根源何在,我比较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一种由温州人提供,另一种则来自官方话语和大众媒体。 020

在第七、八两章中,我考察了在这一流动人口社区当中,空间和权力的私有化怎样引发了上级政府、温州人和本地居民之间一次公开的政治冲突。第七章用细节呈现了行动期间的多重社会冲突和民间的反抗,强调了政府内部的差异性和不稳定性,分析了行动背后的动机。第八章记录了温州人的被迫出走与最终返回浙江村。这里关注的是这些返回的温州人,通过与地方政府、破产的国有企业形成新的商业联盟,来重建他们的经济与社区生活。

中国城市的结构性转型在进一步深化,结论一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评估了流动人口及其聚居区的未来,并且提出本研究对反思晚期社会主义中国和其他后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空间、庇护主义(clientelism)、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等问题上所含有的更为广阔的意义。 021

第一章 作为主体/对象^①的流动人口

由乡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司空见惯,并非中国特有。但在后毛时代,作为一类新的对象,“流动人口”这一概念及其所附带的政治、文化意义却是中国特有。在史无前例的人口空间流动时期,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试图将数百万流动人口转化为第三类主体(非城非乡)?为了实现这一对象化的过程,国家实施了哪些话语的或非话语的(discursive and nondiscursive)实践?而流动人口本身又怎样回应或抗拒新的国家治理模式?

本章将对上述问题展开追问,焦点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政府实践,而恰是这些实践剥夺了流动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相同权利的机会。我认为“流动人口”成为一种新的“分类”是国家机器内外多重策略使然:重新调整的户口制度;命名(naming)、分类(categorization)、媒体呈现的文化

^① 本章的英文题目是: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s Subjects。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使用 subject 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流动人口作为一种新的管理“对象”,二是强调他们并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管理,而是因时因地发挥自身能动性。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此处 subject 含有“对象”和“主体”两重含义,但这种用法中文当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译法。在权衡整个章节对流动人口问题的讨论,同时兼顾本章与全书其他章节关系的情况下,译者勉强采用现在这种生硬译法,但在文中具体的语境下,subject 因意思变化而翻译作“主体”或“对象”,特此提醒读者注意——译者注。

程序(cultural processes);管理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的规定得以创立并实施。与西方一些分析人士和记者的预料不同,后毛时代政府并未打算马上废除户口制度,相反,他们对这一制度做出调整,使其更具弹性,以便满足管理流动人口的新需求。^①

本章前半部分追溯了“流动人口”这一分类的形成,分析其文化意涵以及主流话语中形塑这一分类的三种手法。接下来我将讨论一些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非话语”形式的管理手段。但是,在城市中将外地人异化为“内部的他者”或非公民(noncitizen)并非一个由国家完全操控的单向进程。作为社会能动者(social agents),流动人口有其自身意向、欲求和意识形态背景,因此并不会轻易接受或内化国家规定的从属地位(见 Giddens 1979)。本章的第二部分考查了一些流动人口怎样凭借不断提升的经济资本和购买力重新定义现有社会分类的意义,以及他们怎样挣扎着超越官方所定义的城市市民身份形成他们对“自我”的感知和社会归属感。中国的流动人口可以颠覆现有的社会分类意义(例如“流动人口”)但“不是通过拒绝或修正,而是使用它们,只是其目的与参照都与原系统不同,最终使后者别无选择,只得接受”(De Certeau 1984: xiii)。简言之,“被创造与自我创造”(being-made and self-making)(Ong 1996)这一双向过程在我对流动人口主体形成的考察中是一个焦点。 023

对人口流动的命名与分类

在对汉语“农民”一词怎样在文化、政治上被“发明”出来的研究中,孔迈隆(Cohen 1993)认为现代知识、政治精英将中国的乡村人群转化为“农民”——一种在文化上明显具有差异性的“他者”,而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他们。通过挑战“农民”这一分类“理所当

^① 1994年,一些流传甚广的小道消息宣称由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政府不久之后即将废除这种二元的户口登记制度(见 *Wall Street Journal*, 1994年4月26日)。

然”的含义,孔迈隆进一步在现代中国政治经济重建的背景下分析了这一分类实践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同样,我认为流动人口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分类体系,分析它何以在当代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刻被发明出来是一项重要课题。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当中还鲜有对流动人口历史及其诸多深层文化、政治含义的考察。强调这一分类的社会建构的实质不代表我认为其没有真实的社会基础。相反,我试图阐明人口的迁移是怎样被想象成为“流动者”(floater),以及为什么说这一分类之上所附加的诸多意义是具有实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的分析受到两个重要的理论的启发。首先,分类与命名与社会权力密不可分。“那种将事物条分缕析的分类工作”(Bourdieu 1991: 236)是明确社会意义和秩序的重要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证明的那样,命名与分类不单是描述、反映、再现社会秩序,它还可以形塑或重塑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如 Borneman 1992; Foucault 1972; Koselleck 1985; Zito and Barlow 1994)。

024 第二,在关于非对称性对抗概念(asymmetric counterconcepts)的历史—政治语义学研究中,柯赛莱克(Koselleck 1985)认为历史上所形成的社会概念都不应被视作是孤立的;相反,我们应当探寻二元对立概念之间非对称性的结构关系,以此来指出生产他们的权力关系。受柯氏启发,我坚信要想更好地理解今日中国的劳动力迁移怎样以及为何被想象成为“流动人口”,我们最好追问以下问题:谁在命名,谁被命名?这一分类在何种历史时刻被创造出来,针对何种问题,依据谁的主张?这一社会分类又衍生出了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后果?

在1958年之前,户口制度尚未实施,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曾经在1950年代之初一个短时期内快速增长(见 Solinger 1999a; Davin 1999)。尽管在监控流动人口这方面政府并非完全缺席,但其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稳定,且支离破碎毫无作用。结果,截至1954年,很多农民进入